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上海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

经营期望、冒险决策与企业绩效

——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连燕玲 著

经营期望、冒险决策与企业绩效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连燕玲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营期望、冒险决策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连燕玲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642-2450-9/F·2450

I.①经… II.①连… III.①企业管理-研究 IV.①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485 号

☐ 责任编辑 顾晨溪

☐ 封面设计 钱宇辰

JINGYING QIWANG、MAOXIAN JUECE YU QIYE JIXIAO

经营期望、冒险决策与企业绩效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连燕玲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13.25 印张 267 千字

定价:39.00 元

本书属于以下纵向科研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①《组织期望、冒险决策与企业成长机制研究》，2015 年国家自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502062）；②《经营期望、创新转型与私营企业成长机制研究——基于经济新常态背景的研究》，2015 年上海浦江人才计划（C 类）；③《代理 CEO 经营期望、形象管理与职位升迁》，2015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感谢以上项目的支持和资助。本书核心内容也已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等发表数篇论文。

前 言

企业行为理论将经营业绩与目标期望水平的相对差异作为后续冒险决策的依据,通过将业绩的连续测量转为成功与失败这一更好理解的分类测量以简化决策的流程,这对于理解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综观企业行为理论的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学者对于冒险决策的理解较为简单,主要是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仅考虑到了企业积极的、生产性和合规性的冒险决策行为,很少考虑到企业家的冒险行为有多种其他表现形式(消极的、非生产性和违规性的冒险行为)而构建理论框架。虽然一些经济学者也在探讨公司非生产性和违规性冒险行为的根源,但他们又很少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等组织理论进行解释,而是将违规性的冒险行为大多归于制度的缺陷。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去分析违规性冒险行为的研究并不多,将其与企业积极的合规性冒险行为进行对比的研究更为缺乏。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目标期望水平时,这种期望落差状态会使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进而会引致决策者采取各种冒险行为以改变现状,不过这种冒险决策是表现为积极合规的冒险变革行为,还是消极违规的冒险投机行为仍是一个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认为唯有同时考虑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决策行为,才能更好地完善企业行为理论的相关研究结论,因为这两种冒险决策行为对企业而言可能存在替代关系,即经营期望落差之所以引起或没有引起合规性的以变革为主导的冒险行为,可能因为还存在另外一种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作为替代策略。由此,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与前景理论等,本书主要探讨了经营期望落差(实际经营业绩低于期望水平的差距)与企业合规性和违规性冒险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决策者特征(管理自主权)、行业环境特征(不确定性和敌对性)和制度因素(制度效率和政治关联)对冒险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本书进一步分析了在经营期望落差状态下,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企业(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合规性和违规性冒险决策行为实施上的差异性,以及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决策行为对后续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效应。

通过以转型期的中国家族和国有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经营期望落差显著地影响到企业的冒险决策行为。企业随着内外部经营期望落差的增加而更有可能从事冒险性活动,即强化了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

行为(战略调整和组织变革)的程度,同时也强化了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市场操纵和信息操纵)的程度。然而,由于违规性冒险行为被揭发后将会给组织本身带来较高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损失成本,所以企业在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扩大时即使会选择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但其实施的程度显著地小于企业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

第二,权力主体所拥有的管理自主权在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选择之间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决策者拥有较高管理自主权(充足的组织资源和较低的组织惯性约束)则强化了组织在面临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而弱化了实施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当CEO同时兼任董事长时(管理自主权的强化),组织随着内部期望落差扩大从事合规性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被强化,但并未对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而随着外部分析师预测落差扩大,CEO兼任董事长的企业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被强化,同时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反而被弱化。

第三,组织所处的行业环境特征在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选择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随着行业环境敌对性程度的提高,组织更有可能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而合规性的冒险自救行为则被弱化。然而,随着行业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组织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合规性(除结构调整)和违规性的冒险行为的程度均被弱化。

第四,组织内外部的制度因素在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选择之间同样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相对处于完善的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处于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被强化,而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则被削弱。然而,随着组织拥有政府关系程度的增强,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和从事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均被弱化。

第五,家族和国有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的选择和实施程度上是存在差异性的:(1)在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扩大时,家族企业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比国有企业高,但实施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并不比国有企业高。而随着低于分析师预测差距的扩大,家族企业实施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都比国有企业更高。(2)在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扩大时,管理自主权的缺乏削弱了国有企业从事合规性冒险变革行为的程度,却强化了家族企业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然而,随着低于外部分析师预测差距的扩大,管理自主权的缺乏使得家族和国有企业从事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均会提高,且国有企业强化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实施的程度要比家族企业更高。(3)在行业期望和分析师预测落差扩大时,随着行业环境敌对性程度的提高,家族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从事合规性的冒险变革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程度更高。(4)在低效率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相对于国有

企业而言,在经营期望落差扩大时从事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的程度更强,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实施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而不是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来实施自救。

第六,处于经营期望落差中的企业所实施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对后续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企业所实施的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不利于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提升。然而,企业所实施的合规性冒险变革行为,虽在短期内不利于经营落差困境中企业绩效的提升,但从长期来看则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和改进。进一步,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对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起到显著的修复作用,即组织监督机制的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和外部投资机构监督的提升)能减弱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对后续长期绩效的负面效应。相对于创始人 CEO 控制的企业而言,非创始人 CEO 控制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惩罚机制和更完善的治理效率,所以也能弱化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对后续长期绩效的负面效应。

本书所探讨的学术问题具有以下研究贡献:第一,基于不同社会心理参考点完善了对经营期望落差测量体系的研究。第二,突出了对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冒险决策行为的研究,即将企业的违规性冒险投机行为(信息操纵和市场操纵)纳入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的研究模型,并将其与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战略变更和结构调整)进行比较。这种将企业的冒险决策行为细分为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与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思路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以往的研究框架。第三,构建了企业冒险决策的情境依赖模型,即在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之间的相机产生是情境依赖的,一方面取决于组织自身状态和决策者自身特征,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企业所处的外部行业和制度环境,即提出了影响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之间关系的重要情境因素为管理自主权、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敌对性,以及制度效率和政治关联背景。这种将影响冒险行为产生的情境机制细分为组织内部因素、组织外部行业和制度因素的思路,进一步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以往的研究成果。第四,考虑到家族控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差异性,以及中国转型经济和制度环境的特殊性,进一步分析了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下冒险决策的差异性,尤其考察了社会情感财富在家族企业冒险决策中的影响作用,对于完善企业行为理论和冒险决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进一步完善了家族企业在风险承担方面的理论研究。本书为企业冒险行为的情境依赖和社会心理决策模型提供了证据和解释,给出了中国特定情境下企业冒险决策的行为选择模型。

作者

2016年5月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绪论/1

- 第一节 问题提出/1
- 第二节 研究内容/2
- 第三节 研究意义/6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9
- 第五节 结构框架/11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13

- 第一节 经营期望概述/13
- 第二节 经营期望的理论框架/15
- 第三节 经营期望与决策行为/18
- 第四节 总体性评述/31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33

- 第一节 经营期望落差与企业的冒险决策/33
- 第二节 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关系:情境机制分析/36
- 第三节 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行为对比/47
- 第四节 企业冒险行为对后续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49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57

- 第一节 样本来源与数据收集/57
- 第二节 变量测量与模型设计/59
- 第三节 变量基本描述与分析/70

第五章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74

- 第一节 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的关系检验/74
- 第二节 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关系的调节机制分析/83

第三节 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对比分析/119

第四节 冒险行为与后续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分析/143

第五节 小结/165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169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169

第二节 主要研究贡献/174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176

参考文献/179

后记/19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

企业行为理论与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集中于关注业绩的期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企业绩效是否达到期望水平成为他们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点,进而对冒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当业绩低于期望水平时,决策者将低于期望水平的状态界定为组织处于“失败”或困境状态,而当业绩高于期望水平时则界定为组织处于“成功”状态。决策者阻止失败的动机要强于扩大成功的动机,即企业决策者对于经营困境更为敏感,这种状态的出现直接影响企业的冒险决策,所以处于“失败”状态下(低于期望水平)的决策者往往能承受更大的风险,从事更多风险性行为来改变组织的落差状态(Bowman,1982; Grinyer and McKiernan,1990; Bromiley,1991; Bolton,1993)。

关于低于期望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以企业行为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经营期望落差状态(即低于期望水平的“困境”和“失败”状态)如何影响企业后续的风险行为(Bromiley,1991; Fiegenbaum,1990; Fiegenbaum and Thomas,1986,1988; Greve,1998,2003b; Miller and Bromiley,1990; Singh,1986; Wiseman and Bromiley,1996; Wiseman and Catanach,1997)。一些学者指出,经营期望落差(“困境”或“失败”状态)导致企业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如进行研发或创造新产品,提供新服务(Bowman,1982; Grinyer and McKiernan,1990; Bromiley,1991; Bolton,1993),进入或退出市场,改变产品或市场策略,对战略进行重新定位等(Grinyer and McKiernan,1990; Greve,2003)。但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如 Staw 等(1981)的“威胁—刚性假说”认为,经营困境下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保守谨慎的战略,如削减财务成本、限制新的战略启动以应对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D'Aunno and Sutton,1992; D'Aveni,1989; Fombrun and Ginsberg,1990; Hadley, Zuckerman, and Iezzoni,1996; Schendel and Patton,1978)。

但以往上述研究中,前期学者对企业冒险行为所隐含的一个假定是:经营落差状态仅影响了企业的道德产出,即将研究的重点置于低于期望水平下的积极的、正

当的,或合法性的冒险行为的研究和比较上,而忽略了这些企业可能也会通过消极的、不恰当的甚至是非法的冒险行为以解决经营落差问题。然而,这些消极的、破坏性的甚至是不恰当的和违规性的决策,相对而言是更为严重的冒险行为(Harris and Bromiley, 2007),如果放松对冒险决策的上述狭义的界定,将违规行为作为可选择的冒险行为之一,将会产生新的研究结论。

这是因为,根据 Baumol(1990)的企业家理论,企业家实际上充当了大量的角色,除了从事生产性的经营活动以外,还可能会选择一些非生产性的活动,甚至是非法性的破坏活动,并且这些活动是非常普遍的(Baucus, 1994; Friedman et al., 2003)。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发展以来,我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投机行为(吴敬琏和黄少卿, 2007; 陈刚, 李树, 尹希果, 2008),比如,降低产品质量、虚假广告、制假贩假、拖欠货款、延迟支付、大幅裁员、半夜逃逸,甚至是赤裸裸的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掏空和掠夺等。尤其是在外部环境极为动荡的形势下,如国际金融海啸的余波传导到国内时,部分企业和企业家均暴露了他们道德责任的缺失。在 2009 年全国“两会”特别报道上,代表委员们还专题归纳了七种典型的“失德行为”。《2013 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发布,进一步对企业家所实施的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统计调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搜集到 2013 年度新发生的企业家犯罪案件 463 例,涉案企业家共计 599 位。在 2013 年度发生的 463 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犯罪案件 110 例,占企业家犯罪案件总数的 23.8%;涉案企业家 128 人,占涉案企业家总数的 21.4%。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犯罪案件 352 例,占案件总数的 76.3%;涉案企业家 469 人,占总人数的 78.6%。犯罪种类之多,包括且不限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行贿罪、挪用资金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文献,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期望水平而出现经营落差时,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之中,这种状态会引致决策者采取冒险行为以改变现状(Ketchen and Palmer, 1999),不过这种冒险行为是表现为积极合法的变革性行为,还是消极非法的投机性行为仍是一个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认为唯有同时考虑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才能更好地完善企业行为理论与前景理论方面的相关研究结论,因为这两种冒险行为很可能就是一种替代关系,即低于期望水平的经营落差状态之所以引起,或未曾引起合法性的以变革为主导的冒险行为,可能因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冒险行为,即非法的以投机为主导的冒险行为作为备用。

第二节 研究内容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组织的行为是目标导向的、历史和路径依赖的(Levitt and March, 1988),同时受到企业绩效与期望水平之间差距的影响(Ansoff, 1979; Cyert

and March, 1963; Fiegenbaum, Hart and Schendel, 1996), 当组织未达到期望水平, 即组织处于经营困境或失败状态时, 则会促使组织进行冒险, 组织通过采取一系列风险行为来改变组织现状, 甚至也会采取非法性的冒险投机行为来规避组织利益损失。基于期望理论(Argote and Greve, 2007), 企业行为理论(Cyert and March, 1963; March and Simon, 1958), 前景理论(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并结合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 社会心理参考点理论, 制度情境理论以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等, 本书构建了一个关于“经营期望—冒险决策—企业绩效”的研究模型, 主要进行以下几点研究: (1) 从企业自身、所处行业环境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 分析了经营期望的内外部构成维度。(2) 探讨了经营期望各维度对企业的冒险决策和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冒险行为产生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效果的差异性。(3) 分析了经营期望影响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冒险行为的情境机制, 将“决策者”“行业环境”和“制度效率”等因素纳入经营期望与冒险决策的研究框架中, 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机制。具体研究内容和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 构建了经营期望的测量体系, 分析内外部经营期望差距对组织冒险决策的影响效应。组织的期望是多维度的, 首先, 组织希望维持自身绩效的不断提升(历史期望, historical aspiration), 即组织希望当前的绩效水平与企业自身过去绩效水平相比, 要等于或者高于历史绩效, 而当业绩水平低于历史绩效时, 这种“历史期望差距”(historical aspiration discrepancy) 会促使组织通过调整战略、组织变革和管理团队调整等风险性行为来提升组织绩效而缩小这种历史差距。其次, 组织希望维持自己在本行业内的持续的竞争地位(竞争期望, competitive aspiration), 即组织将本行业内的其他竞争作为“参考对象”(reference point), 当组织自身业绩与同行业其他竞争者的业绩水平相比时, 如果低于同行业竞争者的业绩水平, 这种“竞争期望差距”(competitive aspiration discrepancy) 也会促使组织为了维持和恢复自身竞争定位的需要, 变得更加偏好风险, 通过采取一系列风险性行为来提升组织竞争力而规避潜在的利益损失。比如, Mone 等(1998)认为, 企业业绩的下滑会导致组织将现有处境评价为损失, 由于损失规避, 企业会做出更多的风险性行为, 如进行创新。最后, 组织不仅希望具有更持久的成长性(历史期望)和行业竞争性(竞争期望), 也希望组织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而拥有一定的地位、声望以及被社会利益相关者认同, 且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这种希望组织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认同度和合法性的期望, 称为组织的“社会期望”(social aspiration), 当组织未能达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预期时, 组织会面临地位、身份、合法性和认同度的丧失, 即组织希望被社会认可的期望并未达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同样会采取行为来达成组织的社会期望。所以, 本书除了考察组织的历史期望和竞争期望外, 还考察了外部社会期望对组织的冒险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分析, 最终本书确定了三种经营期望落差: 低于历史期望的落差、低于行业期望的落差和低于外部分析师预测期望的落差。前两个经营期望落差是企业自身根据以往业绩表现, 以

及以往同行业内的竞争者的业绩表现所确定的,均属于企业内部期望差距,而低于分析师预测差距则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所设定的期望水平,所以属于企业的外部期望差距。本书重点分析了上述三种经营期望差距对企业冒险决策和不同价值取向的两类冒险行为的影响效应。

第二,分析了经营期望差距对企业的冒险决策,即对两种冒险行为(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影响机制。在经营期望未达成的情况下,即组织绩效低于期望水平时,组织实施风险承担的程度会增强,比如,通过新的市场进入、兼并、收购、市场搜寻、研发创新、计划调整等,改变组织现状以维持和提升自身成长性、竞争地位和社会认同度。除此之外,组织的决策者也会采取违规性行为来应对组织业绩的下滑,如当业绩状况不佳时,以维持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投资者对组织的信心,为确保自己未来再融资,管理者会通过信息操纵,如采取粉饰财务报表的形式(向上盈余管理)来向外界传递一些“美好”的信息以应对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此外,当组织资源、能力和机会匮乏而无法通过启动新战略、市场搜寻和研发创新等合法性行为来应对业绩下滑时,组织为规避自身利益损失也会采取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如降低产品质量、虚假广告、制假贩假、拖欠货款、延迟支付、大幅裁员、半夜逃逸甚至是赤裸裸的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掏空和掠夺等,尤其是在外部环境极为动荡的形势下,企业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更为严重。所以本书将冒险决策作为研究的重点,探讨了经营期望落差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一是分析了对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的影响,本书主要考察了两种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即企业的战略调整和组织结构的内部调整,这也是处于经营落差状态下时,企业所实施的较为普遍性的应对行为。二是分析了对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影响,本书主要考察了财务方面和资本市场上存在的两种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即企业的信息操纵和市场操纵行为。

第三,将管理者纳入研究框架中,分析了管理者的特征在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经营业绩与期望之间的差距会影响组织搜寻的程度和风险承担的水平(strategic reference point theory),同时也会影响组织选择一个战略推动力的决策(Ansoffian view)。这些观点意味着低于期望差距越大,越会促使组织努力通过战略行动,变革或者风险承担去减少这种差距,组织绩效高于期望水平时,风险承担的程度会下降。但也有例外,首先,组织越接近失败越会表现出风险厌恶而非风险偏好(Miller and Bromiley, 1990; Wiseman and Bromiley, 1996)。其次,即使组织绩效高于期望水平,更高的绩效反而导致了更高程度的风险承担和风险性变革行为的产生(Chen and Miller, 2007)。经营期望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非不一致。本书认为,导致不同结论的原因之一在于,以往的研究并未将组织中的决策者纳入具体的研究模型之中进行分析,或者对于决策者的假定过于宽泛并不符合现实特点。组织的决策者在组织战略决策、行为选择中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他们自身性格、认知特点、身份、背景、目标、动机以及权力

等均会影响他们对组织现状的审视、对组织是否需要实施风险性行为调整以及如何调整,选择何种风险性行为等一系列决定(Bertrand and Schoar, 2003; Baker, Pan, and Wurgler, 2009)。本书重点分析了决策者的管理自主权对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之间关系的影响机制:企业行为理论对决策者实施风险性行为的假定是,他们是极具影响力的人,具有完全的自由度、能力和权力来实施组织的风险性行为(Labianca et al, 2009)。但实际上,企业内部决策者的管理权自由度(managerial discretion)是不同的(Hambrick, 2007; Hambrick and Finkelstein, 1987),权力自由度会影响管理者对组织决策的影响程度,当管理者具有较高权力自由度时,他对组织的影响力才会更强大(Crossland and Hambrick, 2007; Finkelstein and Boyd, 1988; Finkelstein and Hambrick, 1990)。由此,即使决策者能较好地认知组织当前的现状,即使决策者具有高度动机想去改变组织的现状,规避利益损失,管理自主权的差异性也会影响决策者的风险承担,以及影响他们对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的实施。

第四,分析了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敌对性对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企业行为理论主要关注企业自身业绩情况的变化对行为选择的影响,并未考虑企业所处的外部行业环境的状态对组织风险承担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在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下,组织业绩下滑后,尤其是在搜寻空间、资源、机会又急剧减少的敌对性环境下,企业并不会完全通过搜寻新机会、战略调整、组织变革、市场开拓等行为进行应对。对于那些有资源、机会、市场、关系网络、资金支持和声望高的企业,或许有能力通过这些社会称许性的行为进行应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太多外部资源、机会、市场和资金支持的企业而言,它们在面临组织经营下滑的情况下,挽救和规避自身的利益损失的方式就不会仅限于合法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会让这部分企业变得“狗急跳墙”,经济危机发生后,很多企业或企业家表现出的“七大败德行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或许对于一部分企业而言,实施不正当的冒险投机行为来应对自身利益的丧失是不确定性和敌对性的环境下的一种占优策略。本书认为,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敌对性,给组织决策者实施合法性的冒险自救行为带来了更为严重的行为、资源、空间和机会限制,最终影响了组织对非法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青睐,即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外部环境状态下,组织的决策者在行为选择上与正常环境状态下表现的并不一致性。

第五,分析了制度环境对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所起到的调节作用。陷入困境和内外压力下的企业偏好于采取何种冒险方式来实现自救,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比如,不完善的区域制度环境可能更诱使企业从事非法性的冒险行为,而降低了它们从事合法性冒险行为的动机;拥有政府背景、得到政治庇护可能会降低企业进行合法性冒险行为的动力,也有可能提高从事非法性冒险投机活动的动机;等等。本书进一步探讨了制度因素对经营期望落差与冒险行为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

第六,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期望落差下的冒险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家族企业被看作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企业系统和以非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家庭系统的结合体(Stockmans et al,2010; Distelberg and Sorenson,2009; Gersick et al.,1997; Chua et al.,1999; Sharma et al.,1997)。家族企业除了追求经济目标外,还追求社会情感财富等非经济性目标的积累(Gómez-Mejia et al.,2007)。由此,当经营期望落差出现、企业处于经营危机状态时,家族企业所面临的控制权丧失的成本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家族企业会迫于这些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损失压力而比国有企业更有动机通过实施一系列冒险行为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维护家族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连燕玲等,2012)。所以,本书进一步将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状态下,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的实施程度和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第七,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冒险行为对后续绩效改进的影响。

第三节 研究意义

本书主要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探讨了经营期望差距与冒险决策的关系研究,且将决策者特征、行业环境和制度因素纳入“经营期望—冒险决策—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模型中,分析了管理自主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敌对性,以及制度效率和政治关联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机制等重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1)基于不同社会心理参考点,完善了对经营期望差距测量体系的研究;(2)突出了经营期望差距与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冒险决策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3)构建了企业冒险决策行为的情境依赖模型,即在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和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之间的相机实施是情境依赖的,一方面取决于组织自身的内部状态和决策者自身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企业所处的外部行业和制度环境;(4)对家族控制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考察了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是否影响其冒险决策和对不同价值取向的冒险行为的实施。

这一研究为企业冒险行为的情境依赖和社会心理决策模型提供了证据和解释,给出了中国特定制度情境下企业冒险决策的行为选择模型,具有以下具体研究意义:

第一,本书基于不同社会心理参考点完善了经营期望差距的测量体系,有助于系统地认识经营期望和期望差距在战略决策和行为选择中的影响机理,完善了企业行为和组织期望方面的理论研究。

以往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和目标期望理论的研究大多关注“自身当前业绩”与“过去历史业绩”的对比(历史期望差距),以及与行业竞争者“历史业绩”的对比(竞争期望差距),进而确定组织的期望差距,而这种方法忽略了“前

向/外部期望(forward/external-aspiration)”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业绩反馈方面的研究更应该关注未来期望和外部期望对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Chen,2008)。在实际管理实践中,组织往往首先确定长期经营目标,根据预先设定的经营目标不断调整当前的经营行为,使当前的经营状况达到预先设定的“未来目标”。基于此种考虑,本书在经营期望的测量上,不仅仅关注了后向和内部期望(backward/internal-aspiration),同时也关注了当前实际绩效与未来/外部组织期望对比的差异性。此外,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在分析组织期望和期望差距时,主要将自身过去业绩和组织所处的行业内其他竞争者作为“参考点”,这种参考点的选择主要是基于组织更加关注企业自身是否达到了过去业绩水准,是否保持了持续发展以及是否保持了在本行业内持续的竞争优势。但是组织的行为选择和决策制定的出发点,或许不仅仅是出于这种“成长性”或“竞争性”的考虑,比如,他们或许更加关注他们在社会上的认可、声望、合法性等,即组织的外部社会期望,如果组织未能达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预期,组织就会进行行为调整以挽回在特定社会组织中的身份、地位、声望、认可度和合法性等。本书基于上述分析,主要确定三种参考点:(1)基于企业自身作为参考点,对比企业前后业绩差异,即历史期望差距;(2)基于企业所处行业内其他竞争者作为参考点,对比企业自身业绩与行业其他竞争者平均业绩的差异,即行业期望差距;(3)基于外部分析师对企业未来业绩表现的预测为参考点,对比企业实际业绩与分析师的预测差距,即分析师预测差距。

第二,本书重点探讨了经营期望差距与冒险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分析了内部期望差距(历史和行业期望差距)和外部期望差距(分析师预测差距)对两类不同价值取向的冒险行为的影响机制,这将进一步完善风险承担和冒险决策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以往关于经营期望结果变量的研究中,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以变革为主导的合法性的冒险行为,如研发投入、并购、市场进入、组织变革等,较少关注经营期望对非法性的冒险投机行为的影响。本书认为,当组织的期望无法达成时,组织及其决策者也会采取非法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以使组织业绩表现尽快回到可以接受的期望水平上。这种行为的选择大多会发生在组织无能力进行上述以变革为主导的、合法性的冒险自救行为的情况下,或者外部行业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或敌对性程度较高,而制约了组织采取合法性的冒险行为的情境下。为更好地完善经营期望与企业冒险行为之间的研究,本书将冒险行为分为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合规性的冒险变革行为,主要考察了战略变革和结构调整两个具体维度;二是违规性的冒险投机行为,主要考察了信息操纵和市场操纵两个具体维度。

第三,本书将决策者角色纳入经营期望差距与冒险决策的研究模型中,重点分析了决策者的管理自主权(managerial discretion)对经营期望差距与冒险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对于完善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以往关于经营期望的研究中,并未将决策者纳入经营期望和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中,且对决策者的特征普遍存在以下假定:决策者具有完全的自由度、权力、机会去实施战略变革、组织调整、市场进入或者新的搜寻和研发等风险性行为。但是上述假定是较为理想化的,决策者并非都会拥有足够的、完全同质性的权力、自由度和机会等去做这些决策。为更加完善组织期望理论在解释企业行为产生上的作用力,本书将决策者纳入了研究模型中,并从决策者的管理自主权的差异性上分析它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机制,这进一步加深了对组织期望和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认识。

第四,本书将外部行业环境的特征和制度因素(制度效率和政治关联)纳入了经营期望与冒险决策的研究模型中,重点分析了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敌对性以及外部制度效率和政治关联对冒险行为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从外部行业和制度环境方面完善了“经营期望—冒险决策—企业绩效”的研究框架。

以往研究表明,决策者在选择参考点时会在期望水平与生存点之间进行转化,而转化的依据则取决于企业的资源存量(March and Shapira, 1987, 1992; Audia and Greve, 2006),资源存量越少则越有可能感受到风险所导致的压力与脆弱性,此时生存就变得很重要,也就导致了一种规避风险的倾向。所以这就导致了以往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中,大多都在分析企业的资源存量(以冗余资源或企业规模来替代)对期望落差与冒险决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Audia and Greve, 2006; Greve, 2010),而对其他情境机制的分析却极为缺乏。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而言,影响企业家所感知风险高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组织内外部的环境特征和制度因素。由于本书还要探讨经营期望与违规性的冒险投机活动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活动与外部环境和制度因素存在紧密关系,所以,本书将行业环境特征(不确定性和敌对性)和制度因素(制度效率和政府关联)纳入经营期望与冒险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企业行为理论的前期研究成果。

第五,考虑到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差异性,以及中国转型经济和制度环境的特殊性,进一步分析了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经营期望落差状态下,实施冒险决策行为的差异性,以及自主权的缺乏、行业环境的恶化和制度效率的欠缺对两者在冒险决策上的影响。对于完善企业行为理论和冒险决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也进一步完善了家族企业在风险承担方面的研究。

以往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来分析经营期望与企业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的样本来进行分析,并未考虑到企业类型的差异性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尤其并未考虑到企业不同的控股股东的性质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本书在经营期望与冒险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下,进一步依据企业的性质、类型和控股股东的差异性进行了对比分析,对于完善经营期望与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尤其考虑到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两大经济主体确实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如若忽视两类企业本身性质上的差异性,则会使